

老城小铺

孙郁

有点差异,铺子里的人对此分辨很清,一听人的口音,便知道来自哪里。而在一些人的穿着打扮里,也能够辨出社会的身份。

有一家铺子叫“老头店”,因为工作人员年龄大,故得此名。这“老头店”卖的东西很杂,日常用品,各种各样。“老头店”的书记是个退伍老军人,眼睛与手有伤,乃塔山阻击战留下的,是战斗英雄。我的同学的爷爷也在店里,大家叫他“老会计”,珠算水平是一流的。还有一个老人,人称“老字典”,对于各家门牌号记得清清楚楚,一些人家的前世今生,颇能道出一二。店里的老人,商业脑子也好,进货呢,都是民众急需的,所以,每天都有不少客人光顾。

记得有一年镇子里出现了件盗窃案,久而不能侦破。派出所的所长一脑子雾水,他后来找到“老头店”的书记,看看能否帮上忙。支书与“老字典”讲了此事,两人现场走了一圈,又去几个家庭作了调查,回来后让“老算盘”打了几下算盘,便和所长嘀咕了一会。第二天,案子就破了。“老头店”的人,阅人无数,但却极为和气,一般骗吃骗喝的,深知他们的厉害,是不太敢在门前耍横的。

“老头店”旁有几家饭店生意一直很好。城里的菜最有名的是过油肉、水滑肉、酥白肉、应季小海鲜、海肠炖土豆、羊肉汤。其中千层饼的味道是一绝,那饼的做法有点复杂,以至许多外地的馆子都做不出那种味道。母亲的同事闻老师刚大学毕业,独居在学校的宿舍,多次领我去各种小铺子。闻老师学的是中文,诗文的功底,只是不太爱说话。跟着他,我品尝了不少有特色的辽南风味儿。那时细粮少,吃的是二米饭,这是大米与高粱米混着的一种粮食,这已经很难得。印象深的是回家回馆子,菜做得尤其好。但有时候缺货,能否遇到上等的牛羊肉,要碰碰运气。赶上城里大集的日子,小铺子前要排长长的队。别的馆子都有些凌乱,这家馆子却干干净净,坐在里面很是舒服。

老城的夜晚很美,半明半暗中,向西看到骆驼山,南面是永丰塔,破损的庙宇半隐在老树间,像一幅水墨画。太阳落下了,街市仿佛变成另一个世界。孩子们吵吵闹闹地跑到大街小巷玩起来,声音传得很远。但有几个地方却安静得很,一是横山书院一带,晚上没有什么人,但院子里有时会传来笛声,由低而高,好像一支神曲,听着有点感伤。这吹笛的是一位老人,叫什么名字,已经忘记了。他夏天常常坐在树底下自我陶醉,以至成了一道风景。还有一个地方,是清真寺一带,人少而清寂。清真寺位于城西的城墙边,建筑风格特殊,不同于街市的老屋。我有时走到旁边,好奇地要往里望一望,对于其中的回廊与庭院,有种神秘的感觉。

多年后我到土耳其的布尔萨古城,也看到了各式各样的小店铺,感到格外亲切。但离街铺不远的地方,却显得出奇。有一次走在布尔萨的街角,忽听到清真寺传来的晚祷声,还有街头虔诚的人们的表情,一时被震撼了。中外的古建筑虽然形态存在差异,却在什么地方还能嗅出相近的气味。才知道天底下的古城,有同有异,实里含虚,热闹的后面,仿佛都有另一种东西。那是什么呢?好像说不清楚。但那些说不清的存在,现在想来,才更有意思。

去江南几座古镇,看到旧的商业遗迹还在,便感慨南人的精细,也想起当年在辽南老城的生活片段,差异还是大的。辽南与江浙的风俗不一,但古镇的模样有相似的地方。布局规范、古朴,有点旧画里的样子,只是留存的典故不多。南人常视北地乃荒蛮之所,不是没有道理。不过城里的风景也有值得记的,那便是密布的小店铺,每个店铺,都藏着不少的故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房子逐渐残破了,已经与旧时的风气有别。辽南的店铺都很小,即便像老城,一般的商店都沿袭了旧风气。史书上说老城历史已经有千余年,自然也保留了旧岁的某些风气。商业区主要位于城的南街,豆腐坊、回民馆子、水果店、理发馆、照相馆、印染店一字排开。同学的外号,有许多与小铺子的历史有关,因为他们的前辈多是其中的店员。比如刘包子,是包子铺的后人;宋馒头,乃馒头铺的儿孙等;赵两角,大约是鞋铺的另一种称呼。人名与店铺关系如此之深,想起来都有趣得很。

因为商人在城里的比例高,大人孩子都显得精明。曾富过的和未曾富过的人,彼此都客气。革命胜利后,居民们没有多少差异,日子过得都差不多。偶有人重温着旧梦,也是在私下的交谈中的感叹,往者难追,时代毕竟不同了。

虽然经历了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而店铺的格局基本未变,只是多了一些新的单位,比如新华书店、百货商店就是。老城离海近,海产品种类繁多。卖鲅鱼、海带与虾皮子的,多为海边来的人,所以许多铺子都带一丝海带的味道。这些鳞次栉比的小铺子,是孩子们愿意去的地方,许多空地聚集着玩耍的学龄前儿童。奇怪的是,镇子里好像没有幼儿园,只有几个托儿所,大多数的孩子是散落在街面上,跑来跑去的。

稍大一点的孩子有了压岁钱,便到小铺子去买糖果。一个叫“小板房”的地方,糖果品种多。铺子是木板做的,只有一个窗口,隔着玻璃看见各种糖块,我们兴冲冲地跑到那里,站在一块石头上踮着脚,把钱送进窗口,再从中接过几块带花纸的糖块,真是开心极了。有时候也跑到水果店去买一点苹果或者枣之类,感到很大的满足。辽南的枣不好吃,甜味少,可能与水土有关,那时有了许多伊拉克枣,黑色的,小而甜,孩子们是喜欢的。

还有个地方可以去,就是在印染店旁,常摆着一个小人书摊,每看一本三分钱。我是那里的常客,最入迷的当然是《三国演义》与《西游记》,还有现代故事《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等。我对于古人的认识,就是从这些连环画开始的。书摊上还有幻灯片,在一个类似望远镜的装置里,转动几下可以看到一些风景图,比如西湖和颐和园之类的风光。看一次要五分钱,算是贵的。记得摆摊的是同学的母亲,他们家境不好,父亲常年卧床,仅仅靠母亲在摊位上挣点生活费用。摊主对我不错,有时候并不收钱,说道:“看吧,长大了再还我。”

老城人大多不喝茶,所以没有茶馆。行人渴了,就到小铺子旁的百姓家寻点水喝。住户对于来寻水的人都能理解,这大概是一种风气。记得艾氏父子家门口就有一口缸,旁边挂着水瓢,也是为路人准备的,这也吸引了许多人。艾家窗户外上总贴着小艾新完成的素描作品,灵动而可爱。小艾是我的同学,父亲是修理手表的,手巧得很。这也传染给了小艾。小艾的绘画水平很高,可谓无师自通。画马克思、高尔基、鲁迅,无一不像。所以,他们的门前,便成了逛街的人要驻足的地方。

街市流水般的人影,有的一晃消失了,有的影影绰绰地晃在记忆里。来的人与去的人,有的有缘,有的虽陌生,但彼此都知道逛街的相似的惬意。外来的人与本地人

那时我在田林读书。田林在上海西南角。当这里被新辟为住宅区后,原先农田的痕迹被速速抹去,但在一个崭新的街角和一个街角的当中,总还留着些石墙围起来的,尚未建设的野地。春风秋雨一吹,只要一点点泥土,里头立刻抖出过人高的杂树野花,直直透到围墙外。就和田林新村里,兵营般被规划整齐的绿化带里的植物,形成鲜明对比。

城市有城市的生气,野草有野草的蓬勃。那个时候,同学中开始流传,说学校所在那条小路的尽头,在那片野地里,有苍耳。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以物易物,然后在交换的过程中逐渐分离出一套只有自己人才认可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别人的眼里或许一文不值,比如一块香味橡皮、几根铅笔,或一副军棋。有一次我在小区的长椅上,看到一群男孩在互换奥特曼的彩色卡片,那专注的神情,让我顿时回忆起学生时代,有一阵,我们之间通用的货币,就是苍耳。

你不能在校园和小区花园里摘到它,也不能在商店街上买到它。它只在野地里才有。而野地是大人禁止我们去的。所以只有那些敢于去野地的孩子,才有机会摘到。某种程度上,这些人是我们中间的荒野大镖客,他们去西部世界淘金而返,那带着尖锐小钩的橄榄状果实,是我们的金。

野地里有什么呀?你问。危机四伏。去过的人拍着胸脯夸张地说。

野地好玩吗?你问。你不进去,说给你听也没用。那你怎么进去的呀?秘密。

田林十三村靠近田林东路门口,那一小片野地,在我们中间拥有了无上吸引力。每天我们上学放学时经过,很难不去留意它。蓝色石棉瓦板,密密围了一圈。有时一只野猫在板前面蹲伏,回头看到动静,就忽然一跃,消失在野地。人跟着跑上去,却怎么也找不到入口。

但对正在接受规训的孩子来说,这不被允许去的地方是已知生活里的一块法外之地,暗和着魔兽蛰伏的平原,是有亚鸟逊森林般的未知,里头有西游有三国的大观园有神神演义,总之能调动孩子所有的想象力,只要被禁止进入。

同样不被家长允许靠近的,还有学校对面在建工地门口空隙两边的一

些摊位集市。

在我们入校前,这工地就在建,几乎永远也造不完的样子。大家都熟悉了这里的工人,也有了这些供工人吃宵夜的档口出现,一个卖炒饭的,一个做油墩子的,一个卖羊肉串的,一个卖白馒头的。我去买了油墩子吃,回家立刻腹泻,但还是挡不住第二天再去。它是刻板生活里的一点变数,一些与父母老师无关的外人,更别说那里还有一个用蛇皮袋面密密遮起来的棚,不知道卖什么,终日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

有一次我们看到有个阿姨撩起棚帘钻进去,便仗着人多,也哗啦啦跟着尾随钻入。一股干燥的热浪扑面而来,吱呀的声音顿时停下。弥漫整个帐篷里的飞絮,雪一样纷纷扬扬落在我们肩头。

小帐篷里,高处如攀藤一样挂满各种大红湖绿、碎花、格纹的被面子。满地横陈雪白、灰白、黄白的棉花。大家明白过来,这是一家弹棉花的铺子。周边的居民拿了陈旧打结硬的棉花被进来,让摊主拆开弹松。半裸着上身的男人,浑身是汗,正骑在一根竹竿上,用自身的力气以脚踏地,不断弹压着堆成小山一样的棉花。他看到我们一群穿着校服的小孩钻进来,立刻呵斥“出去出去”。他乡音浓重,我们没怎么听清,彼此哄笑着散开,但不肯离去,一定要看他弹棉花。他叹了一口气,坐在那根竹竿上不动。

进来的阿姨催促着他快点弹。他看看我们,犹豫着,终又重新开始工作。吱吱呀呀的声音响彻整个帐篷,盖住了我们喧闹的话语。他的女人坐在地,不停抽着棉絮上的线,转过身来打量我们,她面无表情,衣襟敞开,怀里还有个在吃奶的小孩,那要孩的头发和眉毛上也蒙着一层白,昏黄的光线里,像一个被怀抱着的袖珍的老人。

摊主再次停下来,用他可能用的最接近普通话的语音对我们说“去好

去摘苍耳

沈轶伦

好读书呀”。但我们还是站了一会儿,直到我们觉得那重复单调的工作的确无趣,直到我们明白老师说我们“弹絮像弹棉花一样”究竟是什么声音,直到有新的客人钻进帐篷站不下了,我们才离开。

一个秋天的下午,学校开运动会。有比赛的人在场上忙,没比赛的人聚在一起,还没到放学时间,也不需要回课堂。当发现门卫也在观赛时,同学扯我袖子说,去野地,就现在。

忘了我们是怀着怎样激动的心集中到野地门口。一个进去过的同学熟门熟路将一块石棉瓦板移开。原来它早就被卸了下来,形同虚设地虚掩着。我跟着同学走进,心跳如鼓擂。知道万一旦被发,老师和家长一定会骂。但越是怕,越是恨不得立刻进去。

秋天的野地,野草都比人高。我们走进去看就不见彼此了。只听见草丛里有虫鸣的声音,风吹过,野花金灿灿,似麦浪起伏。同学们打打闹闹的声音传过来。忽然谁“哎呦”了一声,高声说手被扎了,是苍耳。大家在呼噜声中环顾四周,这漫天漫地的苍耳啊。几乎一刹那,也没有谁宣战,大家都就地摘下苍耳,拨开野草找到同学,互相扔向对方。

城市里的孩子,被约束习惯了,哪里见过这种阵仗,我们是在学校的操场上,都要按照地上一个个彩点隔着固定距离排队站好的人,我们是按照学号或者按照成绩永远在固定序列里的人。而现在我们满脚是泥,衣服上都是草子,苍耳的小钩子,钩在我们的头发上、衣服上。大家疯玩着,直到有大人的声音出现,直到我们蓬头垢面地被老师提溜出野地的围栏。直到我们发现老师背后,站着神情严肃的门卫,门卫的后面,跟着那个衣衫不整的,满头白絮的弹棉花的男人。

后来才知道,是这个弹棉花的人发现我们朝这里走了,是他叫来了

学校的门卫。在野地的当中有一个深水洼,平素工地里的人溜进去去洗刷和钓龙虾。他怕我们学生娃不知道草的深浅。

野地的吸引力,很快在老师和家长的轮番呵斥后降温。或许也不是因为被禁止,而是因为我们去不了。解密本身让野地祛魅。这里面并没有海市蜃楼,也没猛兽妖怪,就是一片简单的无聊的荒地。我们进去过,触摸过,也就走出来了。当我们重新换了干净校服,隔天端正正坐在课堂里的时候,彼此之间流行的新货币,转瞬已换成新出的干脆面里的小流熊卡片。

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全班去余山的青少年野营基地。那是大家第一次离开父母外出住宿。人生中的第一次,总是令人印象深刻。差不多一周后回来时,大家都觉得自己与离去时的自己有些不一样了。校车驶入田林东路,转弯,快要到学校了。忽然车上,有同学叫起来,“看那里!”

是野地的位置。我们从车窗一侧望出去,石棉瓦板被拆掉了,过人高的荒草也被铲平了,卡车开进开出,我们停车,为一辆水泥搅拌车让路。这里要开始施工了。一种自己私藏的秘密基地被人发现的感覺,让车厢里的孩子沉默了。车到校门口,又见学校对面,那个几乎永远一直在造的工地竟已竣工。围墙和工人都消失了,连带工地门口的那些摊位和市集,那个蛇皮袋面搭建的帐篷,一切仿佛从未出现。

坐在车辆前排的老师说了一句话,是那几天新闻里天天听到的话,上现在要“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九十年代初的一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此撞进了我们曾熟悉的慢速的生活。

大概十来年后,有一次我随父母做客。拜访人家,紧贴着我昔日的母校。从这户人家的阳台望下去,正好能俯瞰过去野地所在的位置。从这一览无余的角度看下去,下面已经是一片规则的住宅区,西侧是徐汇影剧院。田林现在是上海相当成熟的社区,不再有任何未开垦的野地,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

而我站在阳台上。站在两种存在的当中。阳台背后的窗内,长辈收拾碗筷,杯盘交错,是一种现在进行时;阳台上,是过去时,是只存在记忆中的野地。

野地里,有过我们的幻想。有过野草。有过野草当中,一个我并未亲眼见过的水洼,还有那个弹棉花的男人,我已记不清他的面孔和声音,我在脑海中看见他为了我们奔向学校的门卫。纷纷扬扬的时光,纷纷扬扬的白棉絮,落在他的身后。

我还记得从野地回来大概一年后,有一天在掏卷子时,从书包底掏出一个被遗忘的苍耳。那时我们已经开始用电脑学着上网了。放学后即便最皮的男孩子也是聚在屏幕前,而不是去找野地玩。唯有那小小的钩子,提醒着我们在野地度过的短短的几分钟——全然忘我的、真切的、漫长的几分钟。

那硬刺戳痛手指的感觉还那么明晰。

大姑姑勤劳了一辈子,却也穷苦了一辈子。直接的根源是她嫁了一个不成器的丈夫。那男人嗜酒如命,动辄烂醉如泥。唯一的好处是脾气好,这对于赚钱养家并无用处,反倒因此羁绊了大姑姑一生无法离开。在农村,活计重,顶门立户过日子多半靠男人,男人不行,日子先倒了一半。

那年家里盖新房,大姑父也来帮忙。晚上收工,他与一群泥瓦匠喝得酒酣耳热,大谈中日美苏国际形势。我往来端菜添汤之际,听他高谈阔论,那张脸愈加酱红,牙黄森然,不由心生恼怒与怜悯,替大姑姑不值。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寒冷,滴水成冰。春节前三天,大姑姑去世,还差两天她过生日了。大姑姑出生是在腊月二十九,她吃素,每年她过生日这天,按本乡习俗也是吃素人过天的日子。她再也没等到生日的那碗素饺子了,她终于没能跨过年关去。

多年后一个秋日的黄昏,我回大荒老家,在那道壕上走过。村东头第一家,曾是大姑姑的家。大姑姑走后,这间房屋后来被夷为平地,耕种上了玉米。房子不见了,呼呼作响的窗户和破洞的草编炕席,还有那常年醉醺醺的人,都统统不见了,只剩下寂静的秋风沙沙地吹过,白杨林的叶子哗哗抖动。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大姑姑若想家了,该看向哪里呢?我抬头,西天的晚霞映照着长空,烧出火一样橙红的光来,诗一样美丽。

笔会

十九秋 (国画)

何家英



大荒女人

周静

黄昏时分,我骑行回家。车子在街市的海洋里穿梭鱼游,不期然,闻到一缕特别的味道。好熟悉啊,似香非香,带着浓稠馥郁的山野清幽,好似一个外来者闯入,是那样的突兀。

循着味道找去,只见一个骑摩托车的背影,驮一大捆青草,匆匆驶过。那草足有一米多高,叶子苍绿,草茎微黄。车子转弯时,那背影回头,露出一张女人的脸。我不由恍惚,这脸,太像一个人了。然而我知道,一定不是她。愣怔片刻,那女人驶得远了,只留下丝丝缕缕的青草味,在空气中飘散着。

那张脸太像大姑姑了。一样的苍老,一样的古铜色,腿上有被太阳晒出的斑,不同的是这张脸微圆,看上去很健壮。我那苦命的大姑姑年轻时也曾这般健壮,只是我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了,她已与大荒的故土融为一体。

大姑姑是个受苦人。每次我走过村东那道壕,总会望一眼壕坡下的白杨林。大姑姑就埋在那里。壕这边,是她生前的房屋。她临走前留下话,埋得近些,不要离家太远。大姑姑53岁时,因喉癌去世。走之前她受了一年多的病痛折磨,嗓子哑得发不出声,人瘦得好似皮包骨。

大荒的女人就是这样,一辈子也离不开土地。她们就像脚下这片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一株植物,在泥土里扎下根,终其一生都在土里刨食,从土地里寻取一生所需。直到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把骨头肉又都还给这片土。

1998年冬天,我中专毕业回乡,在等待工作的空档,时常牵着奶奶的手散步,去大姑姑家串门。奶奶晚年特别慈祥,满头银发,用几根发卡别在脑后,拄着拐棍站在阳光下,笑眯眯的,宛如油画。据说奶奶当年美貌能干,被爷爷看中,单枪匹马上门提亲,很霸气的娶了回来。但爷爷后来当了干部,干工作顾不上家,奶奶带着孩子们吃了很多苦。家里没吃的,揭不开锅,奶奶生下小姑姑第三天,不得已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去田里挖苜蓿菜,落下一身病。小姑姑长到几十岁了,还一脸菜色。

奶奶家院子里有一棵多年的老杏树,每年结很多黄杏,星星似的挂在繁密的枝叶间。杏子修长,像眼睛一样好看,味道清甜可口。我上小学时,一到秋天,奶奶就挎着小柳筐到学校门口卖杏子,一分钱两颗杏,赚几盒洋火钱。我放学时总是绕行,唯恐见到奶奶,她给我杏子,而少卖了钱。

在爷爷去世三年后,奶奶也病了。她的眼睛像是起了雾,渐渐看不清了。寻医问药不见起色,奶奶便坦

然接受了现实。但她卖了东西了。奶奶像有预见性一样,挨个上门探望几个子女,甚至在城里三姑姑和小姑姑家分别住了几天,才坐火车回来。我去领着奶奶出来,她要到村里转转,尽管她什么也看不见,但她就那么笑眯眯地慢慢走。

她来到大姑姑家,大姑姑挽留她吃饭,问想吃什么?奶奶说,吃豆包吧。时值严冬,家家户户都蒸几大锅粘豆包,冻到缸里放进仓房。这是东大荒乡间多年的习俗,小孩子拿着冻得像石头一样硬的豆包当零食,啃掉外皮,吃里面的红豆馅。再穷苦的人家也不差这点黄米和红豆小豆。奶奶的意思我懂,她不是多么想吃豆包,而是认为这东西家家都有,大姑姑不必为她做饭劳神破费。然而,偏偏大姑姑家真的没有豆包。她空荡荡的家里,只有几扇漏风的窗户,在北风里呼呼作响。

大姑姑非常窘迫。年迈的瞎眼老母亲来家里,说要吃豆包,她却没有了,这怎么行?她红了眼圈,站在屋里愣了片刻,转身走出去,红着脸来到邻居

家。她拿出家里仅有的两颗鸡蛋,打算换几个豆包。邻居佯作不知她的窘态,连声说,今年的豆包蒸得不太好,若不嫌弃,就帮忙吃些。言罢,不由分说地装了满满一盆豆包,给大姑姑端了过去。这个乡下女人用她的善良,维护了另一个贫苦女人的自尊。

后来,在大姑姑家吃完豆包,我领着奶奶回到我家,给奶奶打热水洗脚,修剪趾甲。奶奶笑眯眯地用她看不见的眼睛望着我,说,没想到得我小孙女的济了。

不久后,奶奶去世。走之前两三天便不肯进食,我去看她时,她已进入弥留之际。我呼唤她,她在昏迷中后,还回头应,是小娜娜吗?随后没多久便走了,特别安详。大姑姑悲痛欲绝,哭得声嘶力竭,嗓子就此哑了。她一直不肯抓药,结果不知怎地竟转成了喉癌。

都说女人柔韧,大荒的女人却是如此。身体的疼痛一概不说,唯有一个忍字。那一副副不言不语的皮囊底下,包裹起了多少痛楚和风雨,谁又在意呢?

